



晚清安徽巡抚邓华熙史略

汪 军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汪军 编著

晚清安徽

华熙史略

时代文艺出版社

晚清安徽巡抚邓华熙史略

作者:汪军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5

插页:8

字数:100 千字

版次:2001 年 11 月

印次: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书号:ISBN7 - 5387 - 1512 - 6/I · 1406

定价:12.80 元

THE OBSERVATION POST

春秋

二〇〇〇年 四月份 第八九一期



本刊特約撰述鄧又同先生偕皖江作家汪軍（左）訪問康有為故居，在門坊前留影。門坊上「大同」二字乃康有為所書。

（請參閱本期鄧又同先生撰「訪康有為故居」一文。）

港幣十二元正

作者与邓华熙裔孙邓又同先生访问康有为故居，刊于香港文史专业杂志《春秋》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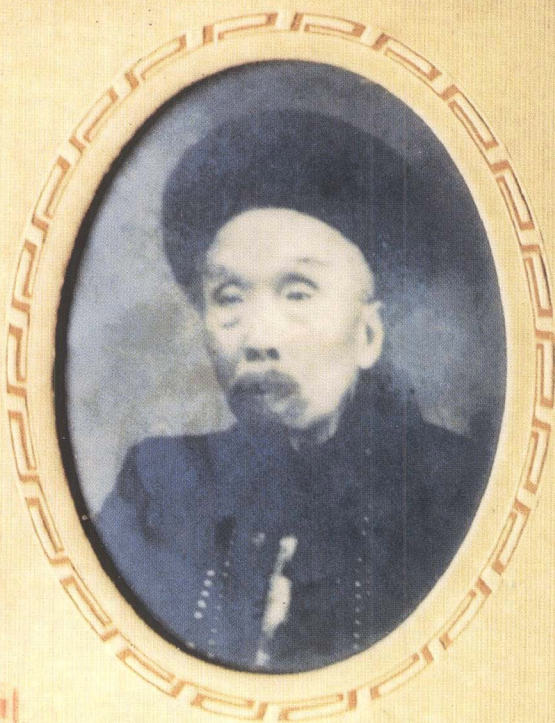
作者与美国新儒学大师成中英先生左、台湾达摩书院院长张尚德先生右合影



作者与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合影

鄧華熙公遺像

廣州博物館惠存



鄧
又同贈



一九五六年二月

邓和简公遗像



邓和简公德配吴太夫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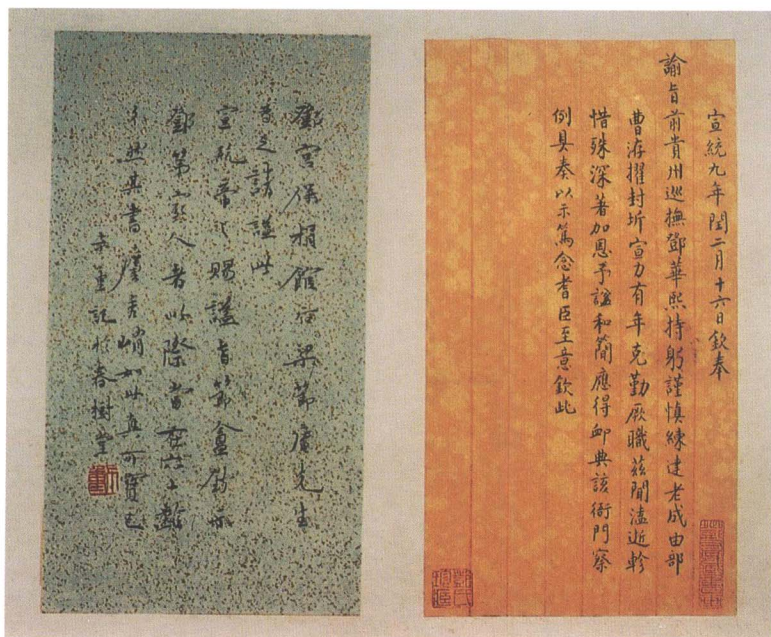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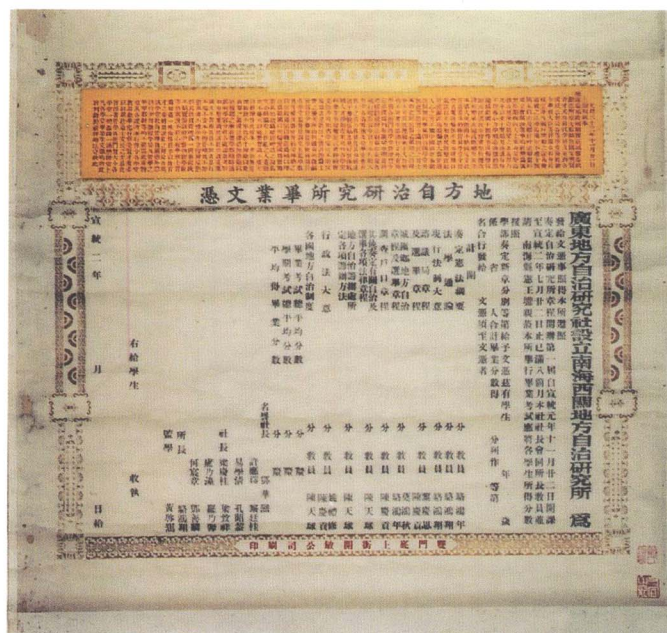


邓和简公遗作



清德宗景皇帝(光绪)
三十大寿赐各大臣金绘箴扇

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文凭
晚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因预备立宪，清廷命令各省市县地方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此乃当年广州西关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文凭
文凭下款署名：名誉社长邓华熙



左：梁鼎芬手扎 右：一九一六年邓和简公逝世，梁鼎芬转达清室上谕哀悼并加恩赐谥“和简”

奏為恭賀

天喜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電傳邸鈔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奉

上諭朕自冲齡入承大統上年以來氣體違和敬念祖宗締造之艰深恐弗

能克時邁之雅深恐弗克負荷追維入繼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

穆宗毅皇帝為嗣繼登至為聖大慶歷及此叩薦

穆宗毅皇帝立嗣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

王載漪之子溥儀為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奉



奏為恭賀

天喜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電傳邸鈔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自冲齡入承大統上年以來氣體違和敬念祖宗締造之艰深恐弗克負荷追維入繼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

穆宗毅皇帝為嗣关系至為重大忧思及此叩懇聖慈於近支宗室中慎簡賢良為

穆宗毅皇帝立嗣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

王載漪之子溥儀為

穆宗毅皇帝之子以縣統緒等因欽此

凤纶宣布鳧藻肅欢钦惟

皇太后德厚坤元

治光泰运

璇宮宣训施

母教而式扩鸿图

宝册敷文

裕孙谋而喜黍燕翼

温诏秉承夫

慈命深祝藩筦庆之贤元良

教育於英年縣

列圣递传之緒

穆宗毅皇帝之子以縣統緒等因欽此

鳳綸宣布鳧藻肅歡欽惟

皇太后德厚坤元

治光泰運

璇宮宣訓施

母教而式擴鴻圖

寶冊敷文

裕孫謀而喜黍燕翼

溫詔秉承夫

慈命深祝藩筦慶之賢元良

教育於英年縣

列聖遞傳之緒



先帝神安於天上
鴻祚綿天下民望愜於寰中蛾忱傾向臣忝膺疆寄欣

際時和敘

皇嗣之延麻享

天心之丕應

彝訓而昭聰聽萬斯年之紀武肇基演

福疇以驗會歸五者备全用徵咸叙所有微臣欢忭下忱

謹繕叩賀

天喜伏乞

皇太后聖鑒

知道了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

日

立繼是國家大事

詔示天下各行省督撫跪奏恭承斯為

和簡公抚皖時奏摺雖具後以義和拳

事變更伏讀之餘暨恭玩

御筆硃批仰見當日敬天尊祖勤民

之意矣
庚辰夏南海任元熙敬跋于九龍旅次



先帝神安於天上

鴻祚綿長下民望愜於寰中蛾忱傾向臣忝膺疆寄欣

際時和敘

皇嗣之延麻享

天心之丕應奉

彝訓而昭聰聽萬斯年之紀武肇基演

福疇以驗會歸五者备全用徵咸叙所有微臣欢忭下忱

謹繕 叩賀

天喜伏乞

皇太后聖鑒謹

奏

知道了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望日

立繼是國家大事

詔示天下各行省督撫跪奏恭承斯為

和簡公抚皖時奏摺雖具其後以義和拳

事變更伏讀之餘暨恭玩

御筆朱批仰見當日敬天尊祖勤民

之意矣

庚辰夏南海任元熙敬跋于九龍旅次

启蒙传统与近世江南文化(序言)

汪 军

问：邓华熙是何许人，请你先介绍一下？

答：邓华熙是广东顺德龙山乡人，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中举。咸丰四年(1854)参与顺德团练局事务，因筹饷有功，议叙刑部员外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逼北京，邓华熙任京师巡防处办事员，条陈抗敌方略数千言，受到恭亲王奕訢的赏识，提拔为刑部郎中。此后，他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云南大理府知府、湖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等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至二十八年九月(1902)，先后任安徽、山西、贵州巡抚。光绪二十八年，因病在任内开缺，告老还乡。1916年病逝于广州，卒年九十岁，谥“和简”。

问：你一再关注邓华熙这个人，但据我们所知，邓华熙在中国近代史，甚至安徽近代史都很少有人提及，这是为什么呢？

答：这只能说是一种悲哀，其原因恐怕与我们意识形态色彩太浓的历史观有关，另外也与安徽具体的省情有关。我关注邓华熙是因为我不能不关注他，如果你熟悉安徽近代史，你就

知道，近代安徽第一个新式学堂(求是学堂)、第一个军事学校(安徽武备学堂)、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近代铸币厂、第一个轮船公司(泰昌)、第一个蚕桑公司(日新)等等，统统都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而他主政安徽只不过短短四年时间(1896—1900)，这样一个人，为安徽近代化干了这么多实事，我们却有意无意地漠视他，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问：你刚才讲的历史观问题，另外还有安徽省情问题，能否具体谈一下？

答：自从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走向末世，各种暴力日趋增多，“仇恨文化”在社会蔓延，汉人与满人的仇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清政府对外国的仇恨，民对官的仇恨，儒教、佛教、道教对基督教的仇恨，使整个社会心态失衡，从“仇恨文化”到“革命”到“阶级斗争”，这是一种逻辑的发展，改革开放前一直到鸦片战争，我们基本上笼罩在这种氛围中。这种文化氛围，也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观，长期以来，在历史教科书中，谁最暴力，谁最恐怖，谁最革命，反封建、反洋教最彻底，破坏性最大，谁就在课本中占主要席位，而那些平和理性的建设者们，基本上处于被遗忘状态，直到最近才开始被关注。我们姑且不论暴力和“仇恨文化”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但这种现象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打击是致命的，我们现在通过电视可以看见“9·11”恐怖事件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打击和对美国人民心理的冲击，但又谁真正研究过，近代以来中国的各种内乱、外乱对民族经济的破坏有多大？造成民族心理的创伤有多深呢？另外，结合安徽具体的省情，也很突出，安徽北部的淮河流域(两淮地区)和南部的长江、新安江流域(皖江地区)反差极大，可以说，安徽北部是暴力和“仇恨文化”典型的代表地区，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元末朱元璋起义、清末捻军起义，淮西集团、淮军、淮系集团、

皖系军阀、淮上军，曹操、朱温、朱元璋、苗沛霖、倪嗣冲、王亚樵，英雄气混和流氓气，忠奸难分。成者为帝王，败者为匪寇。而安徽南部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儒商文化的发源地，人民性情温和、理性，山川秀美，学派林立，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史最起码有半部是徽商书写的，徽商的勤劳和创造力，带来了扬州的繁荣，孕育出开画坛新风的扬州八怪，导致了乾嘉学派最高峰徽派经学的兴起，也是由于徽商的扶植，四大徽班进京，徽剧艺人吸八方之长，衍生了国剧——京剧。而徽商留下大量的牌坊、祠堂、古民居，已成为中国文化最直观体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出生在扬州一带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祖籍都在安徽的南部，他们也都是徽商的后代。

问：你刚才比较清晰地讲述了两种历史观，可以这么表述一下，一种是暴力的、仇恨的、革命的；一种是理性的、商业的、人文主义的，这两种历史观在安徽北南部得到最大限度的浓缩和体现，有点类似于英格兰文化和苏格兰文化的区别。从你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你是强烈的反对暴力、恐怖主义和“仇恨文化”，但是，它们难道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吗？

答：我曾经遇到一个湖南学者，听他大谈湖湘文化，后来我忍不住打断他，我说别说什么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就是杀人文化，在近现代中国，湖南是杀人最多的省份。我说得很激烈，但也是事实，如果杀人都可以用文化包装，那么文化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后来我又说，应该关注皖江文化，关注徽州文化，关注整个江南文化，我这样说好象有点王婆卖瓜，但我只能谈自己熟悉的东西，讲自己认为比较正确的道理。譬如陈独秀，有理想有信仰，也有血性，但没有血债，说他“右倾”的人想一想，如果1927年陈独秀先动手结果会怎样呢？他以牺牲两个儿子的代价，表明他对与逝去的孙中山先生合作联

盟的忠信。有些时候，只有生命才能显示忠诚，亦才能显示变节者的背叛和无耻。中国人多不善合作，相互利用，过河拆桥，从民族大义来讲，陈独秀的这种执著的“傻劲”和对合作契约的忠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吗？

你刚才讲的暴力，恐怖主义和“仇恨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这要从其根源讲起，汉民族在经历了汉唐时期的文明高峰后，从十三世纪起不断地陷入苦难的被征服时期，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所谓元朝，实际上是蒙古人建立的庞大的欧亚帝国的一部分，在整个蒙古帝国中，汉人尤其是南方人，是劣等民族，是被征服的奴隶。汉族少女出嫁前，第一晚必须与蒙古人睡，“初夜权”属于蒙古人，至今中国很多地方喊父亲为“大大”，实际上是鞑子的谐音。英国一部电影，名字忘记了，讲述被英格兰征服的苏格兰人，少女出嫁前也要忍受这种奇耻大辱，后来一个绿林豪杰与他的恋人反抗这种制度，揭竿而起，最后不幸失败，在断头台上他喊出了最后一个字“Freedom”（自由）。这个绿林豪杰让我想起了朱元璋。现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一提起朱元璋，就是乞丐、和尚，带有侮辱性，与满清的腔调一脉相承。但他们根本没想过已沦为蒙古人牧场的中国，其他汉人的命运未必比朱元璋好多少，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正是朱元璋结束了汉人种族的的不平等、司法的不平等和强加于汉人头上的种种耻辱，所以，他们根本也就无法理解孙中山先生就任民国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率文武官员祭拜明孝陵告慰明太祖。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他们歌颂暴君雍正，歌颂形形色色的汉奴，羞辱抗清义士曾静，甚至无知到把浙江遗民吕留良说成是山东人。这些充分表明，我们现在的“仇恨文化”已不是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中，因为历史已被意识形态化了，真实的历史早已被遗忘，80%以上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祖母的祖母的祖母曾被蒙古人强奸过一回，谁知道张煌言、张家玉？谁还去关

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以这么说,近六百年来不断被征服所产生的仇恨和耻辱已彻底消除了,创伤被抹平得服服贴贴。现在,我们的“仇恨文化”主要是“阶级斗争学说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主要表现为穷人对富人的敌视,穷国对富国和国际游戏规则的不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妒嫉心理,幸灾乐祸,暴力欲望,红卫兵情结等等。因此,我的结论是,我们不去讨论过去的暴力,恐怖主义和“仇恨文化”是否合理,但现在中国的暴力,恐怖主义和“仇恨文化”是没有传统根基的,它是外来的,是“恶”的,阻碍了社会健康理性地发展,清除得越快越好,清理得越干净越好。

问:这种历史观导致你关注邓华熙,也许还有袁昶,也许还有更多其他的人。

答:是的,历史其实很简单,评价一个人,不管他信仰什么,只要他为这个地方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商业,带来了人文主义,就是“善”。如果他为一个地方带来了战争,带来了祸乱,带来了贫穷,就是“恶”。不管他打的是什么旗号,讲的怎么诱人,切莫上当受骗。我们也希望史学家们不要把“历史”弄得高深莫测,我们只需要这个简单的评判标准。

问:你讲的商业、理性、人文主义,中国传统资源中有没有这种东西呢?在我的印象中,无限放大的皇权,等级森严的百官,驯服满足的农民,构成中国农耕文明的主体。另外,皇帝兼宗教领袖,官员兼文人,也是中国一大特色,所以,中国一直没有独立的宗教和独立的史学。而其他的如商人和民间文人,基本处在社会边缘地位。

答:确定是这样,在中国历史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一种秩序,而且所谓的“盛世”就是这种秩序比较稳定的时期。现在看来很可怕,没有什么生机,通过科举进入僵化的官僚体制是人生唯一的选择,这种单调性可能让现代人

感到绝望。但在江南地区，十七世纪前后至中叶，也就是明代中晚期；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清代中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晚清和中华民国早期，这三个阶段，以工商人士和在野文人为主体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所突破，并形成了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江南启蒙文化传统。

问：你讲的江南地区从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这三个启蒙文化阶段，有些什么具体的内容，另外，你讲的“江南”具体包括哪些地方，长期以来，“江南”的内涵一直是模糊不清的。

答：你问得非常好，我先讲一下江南的区域范围，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四种说法：1、明代“江南”包括以下地区：南直隶14府：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4州：广德、徐州、滁州、和州；浙江布政使11府：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江西布政使13府：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临江、吉安、泰州、赣州、南安(尤以前6府为主)。这个地区，在地理范围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海地区和赣江流域。如按现在的省(市)级行政区划，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四省一市，钱杭、承载著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描绘的就是上述地域。2、清代“江南”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二省，清顺治二年(1645)，清廷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清康熙六年(1667)，始分设江苏、安徽两省，但一直保留江南乡试，直到1760年，安徽省会方从南京迁到安庆。3、汉学家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地方城市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谈》等书认为，“江南”和“长江下游地区”是意义相同的概念，即今天江西湖口以下的安徽、江苏沿江江南地区、上海市和浙江省。4、“江南”即